

---

# 社会记忆下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载体探析

## ——以黔东南苗族为例\*

李波<sup>1, 21</sup>

( 1.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2.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贵州贵阳 550025)

**摘要:**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 从社会记忆的角度来看待传统文化的演化, 关注民族文化的记忆建构过程, 以及集体记忆以文化的方式是如何被传承的。同时借助社会记忆理论和模型分析了传统文化的社会记忆载体以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记忆图式, 从民族认知主体的视角反思了人类活动的结构、模式、进化及其规律, 探讨社会进化和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内在形成机制和互动模式。

**关键词:**少数民族; 社会记忆; 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C9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099( 2013) 01 - 0084 - 09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 也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 文化从一定意义上标识出一个民族的个性和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

### 一、关于社会记忆的研究

#### (一) 社会记忆的研究概述

记忆是人的一种生物本能, 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则是人的一种社会行为。关于记忆的社会视角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凸显出来。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界和公众开始对集体和社会记忆予以很大关注,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被认为是从社会的角度来探讨记忆的开创者, 他于 1925 年在《记忆的社会框架》中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 后来保罗·康纳顿区分了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记忆(指行动者具有某种操演的能力)三种记忆。国内近年来的哲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对历史记忆、社会记忆有了许多研究成果。李伯聪、葛兆光、王明珂、钟年、纳日碧力戈、孙德忠等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和鲜活的实例中探讨了社会记忆在文化传承发展中的作用。

---

<sup>1</sup>收稿日期: 2013 - 02 - 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记忆下的聚居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研究”[项目编号 11BMZ036]; “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贵州黔东南苗族生态文化哲学体系研究”[项目编号 211BMZQ089]; 贵州省教育厅项目“云贵高原绿色发展研究”[项目编号 12JD024] 人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李波(1970 - ), 女, 四川资中人,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生。

---

## （二）社会记忆研究的三种取向

总的来说，关于社会记忆的理论研究已发展形成三种取向：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是如何再现的、“过去”与“现在”的关系、社会记忆如何传递延续等，这三种取向本身也是关于社会记忆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即：记忆事件本身的特点问题；社会记忆研究中的社会动力学问题；社会记忆建构过程的机制问题，三者之间相互关联。

尽管社会记忆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但与社会记忆在日常生活行为中的渗透性相比，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理论对其的关注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强社会记忆自身理论的建构，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拓展社会记忆的研究领域，从而促使社会记忆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向纵深发展。

## 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社会记忆载体与形式

文化是环境的产物，文化的发展是文化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作为人化世界的实物形态，文化是凝固的历史或历史时间的结晶；作为观念形态，它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潜在的时空领域，其多样化发展与历史时间的流变和空间记忆事件相关联的。我们认为民族文化首先是一种记忆，这种记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物的记忆（如文物），二是非物质的记忆（如习俗）。民族文化的变迁是在继承、发展和扬弃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有一个重组、建构的过程，民族文化元素自身的生态制衡与记忆方式，将最终决定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型态。民族文化的传承有多种形式，但以人为载体的教育是文化传承中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同时还可以创造新文化，扩大社会记忆的内容。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民族文化记忆是一个民族在与自然界长期的生存斗争中，在与外来民族的交往过程中形成，并铭刻在该民族每位成员的潜意识中，成为他们惯常的生存模式，并以其影响后代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之总和。<sup>①</sup>\*<sup>2</sup>总之，一个族群或民族区别于其他族群和民族，正是他们各自具备不同于其他族群的独特记忆系统，这种记忆体系维系着他们的文化传承。不同层次的群体如家庭、地区、民族以及人类整体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保留着他们关于过去生活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共同组成了社会记忆。正是社会记忆对人类历史地积累起来的实践能力的保存和传递，才有了传统的延续、文化的传承和社会的进步。

### （一）文化记忆——信息的存储

诚然，人的世界并不仅仅是一个直接的在场的世界，它连结着一个间接的不在场的也是无穷无尽的世界，当下直接在场的世界只不过是这个无穷无尽的世界中凸显出来的一个点而已。人的过去的生活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消逝，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记忆既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宿命，人就生活在记忆场中。当我们承认了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社会存在物和历史存在物时，也同样承认了人是记忆的存在物。

文化记忆往往通过物的记忆和非物质的记忆来展现各少数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特有方式、生活智慧，体现民族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生命力和创造力，成为各民族历史的见证。<sup>②</sup>\* \*<sup>3</sup> 这些文化信息主要是通过文字、图形、语言、仪式、习俗等外化出来。

#### 1、以物记事的信息媒介

---

<sup>2</sup> ①张德明，多元文化杂交时代的民族文化记忆问题 [J]. 外国文学评论，2001（3）。

<sup>3</sup> ②喻丹，如何留住贵州的文化记忆 [J]. 当代贵州，2006（14）。

---

人类对信息媒介的探索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未摸索出用文字记事之前，为了突破时空的限制，古人尝试过用击鼓、燃烟、举火或实物传递等方式，将表示某一事件的信号‘传于异地’；发明过结绳、掘穴、编贝、刻契和图画等手段，将含事的信息‘留于异时’。”<sup>③</sup>\*\*\*<sup>4</sup>

结绳记事是许多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具有典型形态的信息传播媒介。在文字产生以前，世界上许多民族都经历过结绳记事的时期。竹木简牍也是一种将文字刻写在竹木上以表意记事、传播信息的媒介物。石刻是以石为材，勒以文字，传播四方，留存于世，一般分为摩崖石刻和立碑刻石两大类。立刊碑石着重于保存史实，碑石的本体功用应当是“永久存留，为历史见证”，但以传播的理念观之，还有“为令众人普遍知晓”的效能，这就是传播和记忆的功能。

流行于清水江流域的黔东南一带的铜鼓是物化的社会记忆的典型代表，它原是一种打击乐器，以后又转化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被民族首领贵族独占，被视之作为一种珍贵的重器或礼器。铜鼓反映了少数民族先民对自然现象（太阳）的崇拜，反映对雨水的渴望，同时也是一种图腾崇拜物，再现了少数民族先民的生活和环境。铜鼓常常与祈年禳灾等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多在欢乐和喜庆的场面中出现，但在苗族和瑶族的丧葬活动中敲击铜鼓也是必不可少的宗教仪式，成为苗族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

可以说，以竹木简牍、石刻、铜鼓为载体的传播形式，将苗族先民从亲身传播时代带入了人类传播的第二个阶段——文字传播时代。

## 2、文字、图画及符号意义

每个民族在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图像、符号来交流信息的过程。文字是在结绳符号、原始图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中国有句古老的成语叫做“书画同源”，就说明早期图形符号是文字的重要源泉。文字的发明被认为是人类文明进化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

文字符号的使用由于印刷术的发明极大地提高了社会记忆的效能和效率。文字的出现和印刷术的发明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极大地加快和扩展了民族记忆传递的速度、广度和密度，同时还给予了超越个体的永久保存的承诺。某特定文化中有阅读能力的成员完全可能凭借自己的阅读进入该民族文化的记忆库，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写作为这个记忆库增添新的内容。这既为民族文化记忆的线性传递提供了方便，也为民族文化记忆库的扩充和累积提供了巨大的潜力，并使以文字印刷为技术基础的社会记忆获得了超强的稳定性和生命力。

作为有文字记载的文化遗产方式，主要有碑刻、重大庆典的纪念性文存、以及地方政令等等，通过文字的记载，可以使乡规民约等习惯法永久留存。任何一个碑刻都与重大活动相关，都是历史活动的见证。其中在清水江流域关于自然生态保护的碑刻文化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这些碑刻中少的只有十几个字，如贵州甘塘苗族的《乡规碑》（公元1817年）、黎平高增苗族的《款碑》（公元1672年）、剑河小广盘龙庵苗族的《永定风规》（公元1817年）等。

凡事总有相反的一面，正因为民族文化记忆过分地依赖非人性化的物质的载体，如果一旦这种承载记忆的物质材料被毁，其后果将是民族文化记忆的丧失。相比之下，口耳相传的民族文化记忆则避免了这种危险。除非特定民族文化社团的人们全部死亡，只要还有一个人存在，只要这个人还有记忆能力，他所属的那个特定民族的文化记忆就不会丧失，也无法被剥夺。许多尚无文字的原始部落至今还保留着生动而鲜明的民族文化记忆就是明证。<sup>①</sup>\*\*\*<sup>5</sup>

---

<sup>4</sup> ③傅修延. 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 [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sup>5</sup> ①如美洲的印第安民族，转引自张德明，多元文化杂交时代的民族文化记忆问题 [J]. 外国文学评论，2001，（3）。

### 3、服饰、建筑、传统工艺与文化认同

居住环境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民族都会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和对祖先的集体记忆，建造自己的家园，形成本民族的记忆场所<sup>②</sup>\* \*<sup>6</sup>，村寨寨址的选择实质上是对居住环境和生存环境的选择，是各民族依照各自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审美情趣所作出的理性选择。皮埃尔·诺哈在研究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发现，历史遗留的地方空间对于地域文化认同的建构有非常大的贡献。于是他主张通过研究碎化的记忆场所来拯救残存的民族记忆与集体记忆，找回群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毫无疑问，记忆场所对于全球化语境中国家与民族认同建构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社会学与文化学领域有一个共识：文化认同是个体在所属文化群体与其场域内形成归属感、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根据美国跨文化学者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一书中的观点，文化的交流与认同过程往往与具体的语境相关。而记忆场所恰好被认为是一种具体化了的文化认同。

如黔东南苗族修建吊脚楼时的选址、营造、结构、朝向、居室布局等就是在已经形成的信仰和苗族先民的“巢居”记忆的约束下进行的，这些不但体现文化体系的层次组合，而且更说明苗族“小社会”的有机结构。从山脉水流的走向确定“龙脉”、“风水”，村落的位置选址体现了文化体系的深层意识理解；再根据地形水流、具体位置，确立吊脚楼等的修建，是为深层意识理解与社会有机结构的整合。因为这些建筑并不单纯只是为了满足民众内心深处对“信仰”与“审美”的需求，还具有促进“圆润良性”村落社会运行的效果。这些“效果”的根源最终还在于文化，也正是人与动物、群体与种属的区别所在。

苗族的服饰中展示着一个丰富广阔的世界，多姿多彩的大自然是苗族服饰样式及花纹构图的本源，服饰图案均取自生活，题材丰富，保留了大量苗族先民生产生活的集体记忆和对自然的崇拜，从服饰中还体现出苗族人民对生命的无等级观念和无歧视意识，他们认为世界万物均有生命均有灵性。在苗族的服饰、建筑和传统工艺均呈现出一种主动维护民族文化及其传统的力量，而在主动或被动的历史过程中，完成对文化整体过程的选择，形成文化认同。

在个人层面上，文化认同影响着个人的身份认同和自我认同，引导着人们热爱和忠实于民族文化，从而保存和扩大着民族文化，并最终将其纳入个人的价值观这一深层心理结构之中。在社会层面上，文化认同则以民族文化为凝聚力整合和辨识着多元文化中的人类群体，成为群体构成的一种类型——文化群体。<sup>①</sup>\*<sup>7</sup>

#### （二）语言——文化实践层面的社会记忆

语言是社会记忆产生、保存和流传的最重要手段。“无论我们用什么语言，我们获得的只是一个更为扩大的方面，一种世界观。”换句话说，人类驾驭了语言，也就拥有了一个动物类所没有的丰富的“语义世界”。<sup>②</sup>\* \*<sup>8</sup>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语言的一切变异都可以算是社会变异、文化变异；同时，语言总是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时空中，因此，语言的一切变异也可以算是历史变异、地域变异。

许多民族文化的记忆是采用口耳相传的方式，如通过口传史诗、传说、庆典、礼仪和祭祀等途径保存下来的。由于民族文化记忆信息的传递和交流采取了直接的面对面的形式，并伴随着相当强烈的情感性和运动性，所以民族文化记忆一旦形成，就

<sup>6</sup> ②这一概念主要来自于历史学，是由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哈 1978 年在编写《新史学》中提出来的。

<sup>7</sup> ①舒丽丽，从“主位”到“他者”的理解 [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02)。

<sup>8</sup> ②德国著名释义学者加达默尔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人类有了语言，所以有了一个“世界”，同“世界”有了一种“关系”，对世界有了一种特殊的态度。

---

强烈地刻印在有关成员的脑海中，不会轻易地被抹去。口语的产生无疑大大加速了人类社会进化和发展的过程，直到今天，口语依然是人类最基本、最常用和最灵活的交流手段。但是，作为声音符号的口语是有其局限性的，其一，口语只能在很近的距离内传递和交流；其二，口语信息转瞬即逝，记录性较差，其保存和积累只能依赖人脑的记忆能力。因此，口语受到空间和时间的巨大限制，只能适用于小规模的距离社会群体或部落内的信息传播，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单纯的口语传播便无法满足客观的需要。同时，由于这种记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活生生的处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的个体，因而民族文化记忆的传承尽管就其强度而言是非常深刻的，但就其广度和速度而言又是非常有限的。<sup>③</sup>

### 1、作为记忆文本的苗族古歌

在苗族丰富的口传文化中尤以苗族史诗为代表，民间叫“古史歌”、“古老话”，学术用语称“史诗”，苗族古歌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也是我国流传下来的惟一非宗教典籍的传世记史诗，至今流传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一带的各苗族地区，是苗族历史文化的载体和集中体现。古歌涉及神话、历史、社会习俗、科学技术、原始宗教、哲学思想等各方面，有“苗族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之称，成为苗族古代神话的总汇和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苗族古歌大多在鼓社祭、婚丧活动、亲友聚会和节日等场合演唱，演唱者多为中老年人、巫师、歌手等。

古歌保存着完整的苗族活态文化体系，表现了万物有灵、生命神圣、众生平等、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和谐发展的哲学思想，它不仅与广大苗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密切相关<sup>④</sup> \* \* \* \*<sup>10</sup>，其间也充分呈现出苗族传统文化的人本价值，成为苗族文化传承中最为重要的记忆文本。

### 2、神话传说、民谣、谚语

神话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产物。神话将客体人化，因此就具有了“人”的性质，神话虽然产生在人类文明还不甚发达的原始时期，虽是先民的想象，但其中却蕴含着丰富的原始智慧和深厚的人文意蕴。

苗族谚语是苗族人民在长期生产劳动过程中的经验总结，它所包含的内容丰富多彩，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几乎对大千世界的每个角落的认识、经验都有相应的反映。这些民谣和谚语有总结生产的知识，也有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有对病理及医药知识的总结等等，这些谚语、口诀，通俗易懂，十分顺口，容易记忆，方便传授，展示了苗族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的文化记忆。<sup>⑤</sup> \* \* \* \*<sup>11</sup>

随着理性的启蒙和科学的昌明，神话传说作为一种社会记忆类型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口承记忆和文字符号却始终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一明一暗、一主一次，既相得益彰亦相互排斥的两种交错并生的社会记忆类型。究其根源，乃在于二者都存在叙述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失真与保真之间的矛盾，各有短长，互补共益。

### 3、禁忌与咒语

禁忌是关于社会行为、信仰活动的某种约束限制观念和做法的总称，是一个民族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交际之中，自发地逐渐形成的一种复杂的特殊的信仰民俗现象。从远古时代起，少数民族把那些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物视为有生命的生

---

<sup>9</sup> ③张德明，多元文化杂交时代的民族文化记忆问题 [J]. 外国文学评论，2001，（3）。

<sup>10</sup> ④龙正荣，贵州黔东南苗族古歌生态伦理思想试论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2）。

<sup>11</sup> ⑤杨世章，苗族谚语试论，苗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9 — 07。

---

灵、神明的化身。人们凭着自己的幻想和假设，以期获得神灵的保护与佑助，继而产生禁忌，认为对神灵的不敬会带来灾难，从而转化为人们的承诺，转化为一种神圣的责任和义务，督促人们严格执行。并通过咒语对违规者的惩罚来告诫村民，强化这种观念，最终使人们产生强烈的自我约束意识。

苗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禁忌习俗，特别是围绕生产环境、生活环境的禁忌习俗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充分表现了苗族人的生态意识和民族性格。这些禁忌习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起着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尤其是在调节人与自然的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三）社会记忆的建构——仪式

社会认同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而生活中的各种仪式提供了考察其实在性的经验领域。仪式通过凸显文化符号、与历史的勾连能力以及对当前现实的诠释，既可以复活旧的集体记忆，也可以制造新的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又和社会认同紧密相关，通过制造共识和辐射话语力量，有力地推进社会认同。近现代以来，除了祭祀仪式的主要表达方式外，就是各民族的传统节日。

可以说，中华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节庆和传统节日，每年通过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发起的民众参与的公开的或规范的民俗活动。在今天这样的多元文化时代，民族传统节日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民族身份的象征系统，承载着该民族的文化血脉。通过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周期性的展示、积累、继承和发展，在拥有同一文化传统成员中产生巨大的亲和力和情感的认同感，并把拥有共同文化记忆的成员团结到一起，从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这些节庆都带着本民族文化的特色，各民族也通过其间的各种仪式不断地丰富和传承着民族文化。这些传统节日类型多样，有纪年性的、祭祀性的、也有纪念性的、农事性的和社交性的等等，从功能上看，有娱神功能、娱人功能，也有传承民族文化、模塑民族心理功能等。作为一种时间性习俗的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它与时序结合构成岁时节日（或称历法性节日）。岁时节日结合了人们关于自然时间的认识与人类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的特殊活动，从而使自然时间具有了人文意义，它们已经从外在的时间点进入民族的“内在的时间意识”，成为人们生活得以依托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日历”。

#### 1、纪念仪式与民族认同

作为特定的仪式隆重举行的标志性的活动，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一个民族的传统生活集中而充分的展现，通过活动或仪式中的种种行为展示并建立一个民族文化的整体系统，因此，节日活动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载体，这既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链接的链条，也是民族精神文化传承的纽带。其间呈现出一个民族的价值观、社会关系、审美情趣等方面的文化原型和集体记忆。当一个民族以节日的形式表达自己传统的时候，会公开该民族的世界观、价值系统，供人们分享、交流和实践，传达出该民族了解世界、认知世界的记忆方式和文化知识。对外，它以其独特的方式、固定的程序形象地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影响和左右其他民族对该民族文化的关注和认知，向周围的异文化族群表明自己的文化身份；对内，是一个少数民族谋求本民族文化发展的一贯性和持续性的文化需要，以此方式传承自己所属群体的文化记忆，并以此作为指认同一族群成员的标志和依据。

从节日集会上看，苗族的“苗年”、“吃鼓藏”、“吃新”、“吃姊妹饭”、“跳花山”、“四月八”，仡佬族的“祭山”、“吃新”，瑶族的“祭盘王”，侗族的“祭萨”，水族的“过端”、“过卯”，彝族的“火把节”，布依族的“三月三”、“六月六”等民族节日，民族风情浓郁，文化内涵丰厚，除了秉承各民族的传统以外，呈现出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的作用。从民间传统的社会管理和道德观上看，民间的族长、寨老、“议榔”、“议款”制度以及尊老爱幼、团结互助、扶危济困、修桥补路等道德取向，在历史上对村寨、社区的秩序稳定与社会发展起着广泛、有效的协调、规范和维护作用。<sup>①\*</sup><sup>12</sup>

---

<sup>12</sup> ①颜勇，雷秀武，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综论 [J]. 贵州民族研究，2007（6）。

## 2、乡规民约、社会习俗

在我国西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作为制度文化的乡规民约、习惯法、礼俗思想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起着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如前所述，禁忌以“趋吉避凶”的效应调节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们在敬畏自然的同时保持与自然的协调一致；而乡规民约与习惯法则以明确的规章一方面保护自然资源，另一方面调节人与人、人与社区的关系；婚育、丧葬等礼俗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这些制度文化以其约束性和强制性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形式不断地传承下来，并辅以执法体制作为保障。

苗族社会的民主议事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尧、舜、禹时期创制过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五刑”。一个充满苦难的民族能够在不断的迁徙以及对恶劣环境的适应中生存下来，必然有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和谐的社会体系，那么作为维持这一体系的道德伦理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社会体制，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正是人的社会需要的体现。清代清水江流域，苗族、侗族民众为了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从各自的实际出发，自发地制定了一些看得见，便于操作既利己又益人的“榔规”、“款条”共同遵守，来保护生态环境和社会秩序，而且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的对触犯者惩罚的办法。“议榔”立法、“理老”司法、“鼓社”管理这三根社会支柱，既是执法的法律机制，又是苗族集体记忆的延伸，三者的和谐统一使苗族人民在艰苦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 3、社会交往与记忆塑造

一个记忆场所往往包含两部分信息，一部分是物质形态，另一部分是故事，两者互为表里。记忆场所不仅见证变迁中的集体记忆，还可以持续性地叙事与传播，维系与促进地域文化认同感的建构。加拿大著名学者拉夫提出了场所文化认同的三个关键性要素，即“物质环境”的认知认同、“行为”的参与认同、情感与意义的体验认同。<sup>②<sup>13</sup></sup>

在文化多样性特征明显的多民族聚居区，人们关注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通过这种方式为人们提供一个互相沟通和社会交往的公共世界。在传统节日中的交往会使得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和每个群体，增加了选择和学习的机会，并促使族群社会记忆的形成。文化的传承必须有文化传承主体的积极参与。因为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产生和演变都是在该民族全体成员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社会中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需要从长辈那里学习传统、接受传统，在生命的延续中，他们又将这些传统传递给下一代。<sup>③\* \* \*</sup><sup>14</sup>

在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节庆中，服饰文化、歌舞文化是节日展示和展演的核心内容。在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中，图案是民族文化的最具代表性的具象符号，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民族歌舞既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表达方式，也承载着民族精神文化的记忆。

## 三、传统文化记忆的结构图式

从认识论根据看，记忆在人的思维和认识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社会记忆对一般记忆的超越表现在，它认为记忆是社会建构的过程和结果，而不仅仅是机械地对所获信息进行编码、储存和提取，更强调记忆过程中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发挥。现实的人类记忆并非纯自然过程，而是实践记忆模式的社会记忆过程。<sup>④\* \* \* \*</sup><sup>15</sup>如果我们从社会记忆的角度来看待传统文化

<sup>13</sup> ②陆邵明，拯救记忆场所建构文化认同，人民日报，2012 - 04 - 12。

<sup>14</sup> ③索晓霞，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运行机制探析 [J]，贵州民族研究，2000(3)。

<sup>15</sup> ④孙德忠，社会记忆论，[M]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 12。

---

的演化，将有助于我们发掘隐蔽的历史真实和丰富的文化样态，把握社会进化和文化传承的内在机制，并通过情境化与反思性的历史知识，形成对当前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新体认。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即建立在认同、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其互动模式上的认知图式和实践理性）和外部结构（即社会环境、人文环境、自然环境、“自我”环境）。外部环境刺激内部结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通过外因不断刺激而保持功能，保持活力。同时，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互为环境，而内部结构的自我调整本身也属于环境调整，亦即“我”也是“我”自己环境的一部分——“我”是“我”的环境。以此类推，各民族之间互为环境、互为内外结构，形成民族和谐共生的全新理论关照，也是生物学“结构耦合”的民族学活用。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记忆是一种与他人相关的群体事件，一个人的记忆需要别人的记忆、群体的记忆的唤起。作为文化意义生产中心的文化主体，其内部的结构和成份是极为复杂的。每个民族文化内部既有官方和民间的分层，主流和支流的交叉，也有边缘和中心的区别。它是长期以来特定民族内部各个社会阶层、各种社会能量之间相互激荡，相互冲突，相互妥协的结果。因此，一个特定民族的文化记忆不是一个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涉及到复杂的文化权力分配和意义操作机制。<sup>①</sup>\*<sup>16</sup>

### （一）传统文化记忆的内部结构

#### 1、认知图式

大量的经验事实表明，不同层次的群体如家庭、地区、阶级、民族乃至人类整体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保留着他们关于过去生活的历史记录，从中汲取力量，形成凝聚力。<sup>②</sup>\* \*<sup>17</sup>而且这种记忆的性质和内容也因时因事而异，或者有意识地抑制和禁止某种记忆，或者有意识地提倡和张扬某种记忆，更多的则是对过去生活的无意识记忆。正如哈布瓦赫<sup>③</sup>\* \* \*<sup>18</sup>所述：对于那些发生在过去的、我们感兴趣的事件，只有从集体记忆的框架中才能重新找到它们的适当位置。当这些框架变化的时候，相应的记忆变化就会发生。是谓“这不是你的过去变了，而是你看过去的态度和方式变了，是社会提供给你的整合和叙述过去的框架变了。”

关于记忆的系统性，哈布瓦赫指出：“记忆事实上是以系统的形式出现的。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记忆只是在那些唤起了对它们回忆的心灵中才联系在一起，因为一些记忆让另一些记忆得以重建。但是，记忆联合起来的诸种模式，源自人们联合起来的各类方式。只有把记忆定位在相应的群体思想中时，我们才能理解发生在个体思想中的每一段记忆。”这一点充分说明，关于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或经历，是一个记忆系统、记忆网络、记忆联合体，不同的个体关于同一事件的记忆不是互不关联的，而是要么一起出现，要么一起湮没。这取决于群体对它的态度与认知。其次，一个人对于同样一件事的记忆在不同的群体中会有不同的联合方式或意义取向。

#### 2、实践理性

同时，社会记忆与历史进化紧密相联。离开社会记忆，将无法把握社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内在机制，无法真正理解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另外当今高度发达的信息处理技术使社会记忆的容量空前增大、形式日益多样、层次越来越细，正在对人类生活发生巨大的影响。

---

<sup>16</sup> ①张德明，多元文化杂交时代的民族文化记忆问题 [J]. 外国文学评论，2001（3）。

<sup>17</sup> ②孙德忠，重视开展社会记忆问题研究 [J]. 哲学动态，2003（3）。

<sup>18</sup> ③ [法] 哈布瓦赫，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M]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10。

---

哈布瓦赫指出，假如关于过去的记忆不断地再次出现，那是因为每一时刻社会都有使之重现的必要方式。这也许可以促使我们区分出两种包含在社会思想之中的活动：一方面是记忆，指向过去；另一方面是“理性”活动，其出发点就“是社会此刻所处的状况”，即现在。因此，记忆与现在的关系也就是传统与理性的关系。“记忆只有在这种理性控制之下才发挥其功能。如果一个社会抛弃或改变了它的传统，难道不就是为了满足这种理性的需要，而且是在这种需要刚出现的那一刻去迎合它们吗？”

④ \* \* \* \*<sup>19</sup>

为什么传统会让步？为什么指向传统的回忆屈从了社会为了当下而用于反传统的理性反思？这是因为这种理性反思代表着社会在其现在的处境中对自身具有的意识。“它们是一种集体反思的产物……如果今天的观念有能力对抗回忆，而且能够战胜回忆乃至改变它们，那则是因为这些观念符合集体的经验，这种经验如果不是同样古老，至少也是更加强大。”这无疑再次证明了集体记忆力量的强大。

### 3、族群精神价值

我们认为，社会记忆可以最简单地理解为“对群体‘过去’的认知”。这种群体认知作为地方性知识是建立在共有的体验基础上的记忆，或者是同代人共有的体验，或者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形成一种相对固定而鲜明的文化标识，以区别于其它群体，它内化于个体之中，成为个体认同的标志。个体总是能从社会记忆中汲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可以说社会记忆给予个体以方向、归属和力量感。换言之，记忆是一种文化规划，它导引着我们的意向、心境和行为。正因如此，社会记忆成为社会成员获得认同的力量之源，是社会共同体成员对一定经验、情感、信仰的共有和分享，它是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的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

这里涉及个体记忆与群体记忆的关系，我们说个体记忆是族群记忆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这不仅是因为个体是群体记忆的组成部分，更因为个体常常从群体思想观念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和阐释自己记忆的意义，或者说，他从族群精神价值那里获得了对理解和阐释个人记忆的框架，个人记忆的意义就是在这个框架中得到阐释。“对于每个印象和事实而言，即使它明显只涉及一个特定的个体，但也留下了持久的记忆，让人们仔细思考它，也就是说，它将我们与社会环境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如果人们不讲述他们过去的事情，也就无法对之进行思考。而一旦讲述了一些东西，也就意味着在同一个观念体系中把我们的观点和我们所属圈子的观点联系起来。”

#### （二）外部结构

##### 1、自然环境

人类关于生存空间的活动包括居住和聚集两大类型，居住与建筑对应，聚集则与环境场所相关。聚居少数民族，即是指集中居住的少数民族。聚居活动的核心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及人类生存的价值取向问题，是识别、判断人类聚居环境的优劣及其发展建设的导向。聚居社区形态的演变是其自身演变的“内力”和各种有影响的“外力”作用于“聚居”所产生的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其动力有来自于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方式及社会心理、审美观等社会深层的支配力，进一步表现为地理环境、社区文化、社会经济、技术进步、政策影响等因素。

作为一种具体化了的文化认同的记忆场所，相比官方认定的、纪念碑式的建筑遗产或者成规模的历史地段来说，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这种地方性的记忆场所更具普遍性、多样性，更贴近百姓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情感。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尹·博尔在《从集体记忆到集体想象》一文中指出，尽管这些记忆场所与城市的整体意象并非一致，或者还未能进入城市的档案馆或者博物馆，但正是它们构成了城镇社区文化的认同性与多样性。通过保护利用具有群体记忆的多层次的记忆场所网络，使不同

---

<sup>19</sup> ④转引自陶东风，记忆是一种文化建构——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J]. 中国图书评论，2010(9)。

---

群体之间、群体与以往社会生活间建立关联，获得情感依恋与价值认同，同时在社会变迁中感受到现有生活的丰富与美满。

## 2、社会环境

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集体记忆或记忆的社会框架并不是个体记忆的简单相加，不是一个数量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空洞的形式，被动地让个体的记忆来填充，相反，“集体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而且，“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规范、社会禁忌，常常决定性地塑造了记忆的社会框架。因此，群体记忆的意思是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或者说，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sup>①\*</sup><sup>20</sup>

## 3、人文环境

民族文化是社会记忆的结果，民族文化元素自身的生态制衡与记忆方式，将最终决定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型态。“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在重现过去的时刻，人们总会受到当前环境的影响，总是趋向于从今天的社会环境、今天的需要、兴趣和利益出发对过去进行重塑。理解这一点就能更好地理解记忆重塑机制的性质。“尽管我们确信自己的记忆是精确无误的，但社会却不时地要求人们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事件，而且还要润饰它们，削减它们，或者完善它们，乃至我们赋予了它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我们对于过去某个场景的回忆和描述，不会是一种被动的、每次都没有差别的“重现”。实际上，我们是在积极地“重新合成这个场景，并将新的要素引入其中，这些新的要素是从当前所考虑的这一场景之前或之后的不同时期转借而来的”。

综上所述，从实践意义看，在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同时，要关注民族文化交流载体的状态，构建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保护和传承体系，就需要借助社会记忆的理论 and 模型来分析挖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现代记忆图式，突出民族认知主体的重要性，通过社会记忆的视角去看待现存世界和人类历史，有利于我们对人类活动的结构、模式、进化及其规律等进行总体反思，特别是对于社会发展过程及其机制的深层追寻和总体探求。

### 参考文献：

- [1] [法] 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 [M]. 毕然、郭金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2] [美] 保罗·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 [M]. 纳日碧力戈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3] 孙德忠. 社会记忆论 [M]. 上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 [4] 傅修延. 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 [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 [5] 张德明. 多元文化杂交时代的民族文化记忆问题 [J]. 外国文学评论，2001（3）.
- [6] 喻丹. 如何留住贵州的文化记忆 [J]. 当代贵州，2006（14）.
- [7] 舒丽丽. 从“主位”到“他者”的理解 [J]. 原生态民族化学刊，2009（2）.

---

<sup>20</sup> ①陶东风，记忆是一种文化建构——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J]. 中国图书评论，2010（9）。

- 
- [8] 龙正荣. 贵州黔东南苗族古歌生态伦理思想试论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2) .
- [9] 杨世章. 苗族谚语试论 [Z]. 苗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1989 — 07.
- [10] 颜勇, 雷秀武. 贵州民族文化节庆传统综论 [J]. 贵州民族研究, 2007(6) .
- [11] 陆邵明. 拯救记忆场所建构文化认同 [N]. 人民日报, 2012— 04 — 12.
- [12] 孙德忠. 重视开展社会记忆问题研究 [J]. 哲学动态, 2003(3) .
- [13] 陶东风. 记忆是一种文化建构———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J]. 中国图书评论, 2010(9) .
- [14] 索晓霞. 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运行机制探析 [J]. 贵州民族研究, 2000(3) .